### 主题栏目:中国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问题研究

**DOI**: 10.3785/j.issn.1008-942X.2011.07.052

#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规律研究

# 汪后继1 汪伟全2 胡 伟1

- (1.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240;
- 2.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既受益于区位优势的天然基础,也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时代产物。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活力,市场与政府是一体化的推动者,而优化资源配置则是其主要内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尽管初步形成了区际分工与合作共赢的格局,但其发展仍受瓶颈因素制约。同时,政府与市场在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各异。未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应立足于区域整体联动与利益分配、政策一体化等制度创新。

「关键词 ] 长三角; 经济一体化; 区域合作; 制度创新

####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ang Houji<sup>1</sup> Wang Weiquan<sup>2</sup> Hu Wei<sup>1</sup>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reasons why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been so fast. One is the location advantage, and the other is the favorabl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is region derived its vitality from distinctive modes of loc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impetus from both market and government, and its primary process is the optimization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pite of the inter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lose cooperation in the Delta, its economic integration is still impeded by some bottleneck.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future of Yangtze River Delta depends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regional interaction,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nd policy integration.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ion innovation

[收稿日期] 2011 - 07 - 05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 2011 - 09 - 28

[基金项目] 2009 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09YS321)

[作者简介] 1.汪后继,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战略与管理、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2.汪伟全,男,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府间竞争与合作研究; 3.胡伟,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府体制与政策研究。

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经济总量最大的区域,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全球六个超大城市群之一";然而,长三角区域中产业同构、地方保护、恶性竞争、跨域合作等难题却一直无法破解,困扰着其健康发展。那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演化规律是什么?如何克服当前区域发展瓶颈以实现未来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思考这些问题更有意义。通过深入分析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演进机理、现状与发展趋势,必将为探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普遍规律提供有益借鉴。

## 一、演进,区位条件与时代特征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之所以能够创造"经济奇迹"并提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离不开其天然的区位优势。具体而言,长三角优越的区位条件包括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等四个方面:(1)地域相连,是指长三角地区处于中国内地沿海和长江所汇集的 T 字形结构的交叉点上,交通便利。区域内腹地广阔,土地富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为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先天条件。(2)人缘相亲。区域内人口迁移频繁,各省区彼此间有着人缘相亲的渊源历史,这种一脉相传的人缘使地区间交流和沟通更为顺畅。(3)文化相融。传统的吴越文化一直影响着这个区域,而上海的海派文化也深深地刻上了吴越文化的烙印。文化相融的区域特征使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有了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更容易形成共同的行为方式、社会价值观和共同遵循的合作交流准则。(4)经济相通。自1842年开埠以来,上海之所以能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体的核心部分,与江浙两省的支持分不开。而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群之间,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的互补性,信息资源共享,资金流动频繁,彼此相互依赖,经济紧密联系。

然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演进历程是漫长的。如果说地理位置是长三角地区与生俱来的先天优势的话,那么区域内成员间经济联动、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则是制度环境与时代背景下共同抉择的后天产物。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大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20 世纪 80 年代前中期,以民间自发推动型为主;第二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以企业联合推动型为主;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市场与政府双向推动型为主;第四阶段是 21 世纪以来,以合作和竞争双重推动型为主<sup>[1]203-209</sup>。显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且这些特征将继续影响其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

首先,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活力源泉。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长三角经济之所以能持续繁荣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较为合适的发展机制。长三角形成了上海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等各具特色的发展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特征的上海经济模式,以"温州模式"为特征的浙江民营经济模式,以从"苏南模式"到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江苏发展模式。如此合适的经济发展模式促成了长三角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形成了经济圈内有效率的分工与合作[2]。

有学者从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角度观察,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过程中伴随着各地区经济转型的区域差异性。上海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线的政府主导模式,而江苏的"苏南模式"则是强化政府管理与集体经济的结合,与两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浙江民营经济的自发创新模式。不同的转型模式主要源于各地区经济发展传统和资源禀赋方式的差异,地方政府因势利导、自主创新的精神使不同的道路逐步趋同。在转轨的路径上,没有统一的模式,也不会存在最优模型,在变革的环境中,找到有效的激励安排才是至关重要的[3]113。

其次,优化资源配置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区域经济圈的实现条件是生产要素等经济与社会资源配置能够实现最优化,包含空间形态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交通设施

一体化、信息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等方面的具体内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上述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

资源配置上的区域一体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间合作。企业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主角,随着长三角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企业间合作必然愈加频繁,包括产品联合开发、技术研发、兼并破产等内容。(2) 产业差异化与互补性增强,如在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旅游、文教、金融、科技、医疗、物流、信息等领域的整合和互动。(3) 市场一体化。长三角区域正逐步形成各种要素市场的有机统一体,包括一体化的消费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力资源市场、产权市场、征信市场、旅游市场、文化市场等等。(4) 信息一体化。建设覆盖整个长三角区域的信息网络平台,打破信息封锁和阻碍,以便各地的商情和公共信息都能公开、透明。(5) 基础设施一体化。各地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联结,特别是大型的基础设施,如港口、高速公路、机场、跨江跨海大桥、铁路,乃至网站、排污管道等。这一方面体现规模化、集成化优势,另一方面体现"快捷"要求,造就更大的"同城效应"。

最后,文化融合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形式与载体。尽管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联系密切,但两省一市之间地域文化却是各不相同,且文化价值观也有所不同。从文化渊源来看,上海通常以"海派文化"自居,江苏则秉承了吴文化的许多传统,浙江则继承了历史上的越文化和浙东学术的精髓;从行为方式来看,上海人的专致严谨、苏州人的放达温和、杭州人的精致舒适,构成了三地都市人不同的传统生活态度;从人文精神来看,上海的高效有序和国际化胸怀、江苏的人文关怀和浓厚积淀、浙江的灵活经营和市场意识,都分别体现了长三角的现代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即使从各地区的发展特征来看,上海长期以工业重地和国际化大都市为特征,江苏则创造性地形成了以"苏南模式"为标志的工业化、国际化进程,浙江则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形成了"温州模式"等民营经济发展之路[4]。

尽管上述地域文化有差异,但是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同根同源,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质的文化特质和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区域文化融合之路。江、浙、沪三地形成的优秀文化主要表现为:浙江的冒险与创业精神,江苏和上海勇于对外开放的文化,上海解放思想、高效服务的政府文化等等。21世纪以来,由于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为追求各自地区实现更好的发展,江、浙、沪三地政府都在相互学习对方的优秀文化,客观上形成了区域文化融合的趋势。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圈在创业文化、冒险文化、政府干预文化、开放文化等四个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融合趋势[4]426-428。

那么,长三角文化融合是如何实现的呢?对区域一体化有何影响?显然,基础设施一体化有利于文化融合。随着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的发展,整个长三角区域形成了资讯、人才与物流共享和相互依赖的一体化网络。在这个网络内部,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日益频繁,经济交往更为密切,人们之间更易形成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与此同时,对于跨地区投资而言,这种文化融合有利于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以促进要素流动和区域贸易化,从而促进经济一体化。诸如信任、信用这样的文化能够促使人们产业合理的行为,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能够增加人们重复交易的几率,减少监督成本;有利于资源优化整合,降低摩擦成本。

# 二、现状:合作共赢与发展瓶颈

当前,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已被确定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其发展正迈入一个崭新的"黄金时期"。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态势正在不断显露出来,合作发展与联动发展已经成为主旋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业结构差异化和互补性增强。长期以来,人们对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存在趋同问

题有较大的争议。前期主流观点认为,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趋同性,且这种趋同性在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地区间的重复建设;但近期有更多的观点认为,长三角地区并不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相反,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分工和协调方面的程度在提高。对于上述观点,刘志彪基于地方政府竞争、产业结构趋同与产业分工演化视角,以长三角27个制造业行业为研究对象,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各行业中的工业总产值分额偏离程度和结构相似系数及区位等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自2000年以来,长三角产业结构并没有出现以往人们所普遍认为的产业同构现象,相反,长三角两省一市产业结构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究其原因,主要是市场力量的驱动,长三角产业结构差异性的存在源于开放条件下企业主动选择国际分工的差别化定位[4]131-165。

二是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强。长三角区域经济圈经过几十年的演进,其区域市场是"一体化"还是"碎片化"始终存有争议。但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与调查统计表明,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日益增强。洪银兴和刘志彪对长三角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算,通过建立由 28 个指标组成的市场化评价体系,结合统计年鉴上的有关数据,得出了长三角地区整体市场化程度为 76.18% 的结论<sup>[5]</sup>。靖学青通过比较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和苏州五个城市制造业内部的结构相似系数与三次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发现前者普遍小于后者,研究证实了在制造业产品结构上基本不存在同构问题<sup>[6]</sup>。徐现祥和李郇从行政边界的视角对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了计算,认为市场分割的阻碍作用下降了近50%<sup>[7]</sup>。顾江则测算出长三角文化市场一体化程度为 63.91%<sup>[8]</sup>。

三是区域生产空间布局更为合理、有效。目前长三角地区正在形成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的一体化生产协作网络,整个区域的空间结构布局更为合理。这种空间布局演进是在区域整体规划得到优化、交通运输成本持续下降、市场竞争机制得到强化的基础上,通过逐步打破区域分割并建立自由流动的产品与要素市场来实现的。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指导意见,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在空间布局上作出了相应调整:一是制造业开始从上海这一传统工业中心向外围的江浙地区扩散;二是依托以国际航运和国际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在上海形成一个新的现代服务业中心。换言之,在上海强化自身优势产业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或一般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周边地区,这些产业在经历分散后重新聚集强化,实现了江苏和浙江的专业化优势。

四是区域公共事务的合作机制建立。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主要表现在合作领域的扩大、合作机构的建立、合作行为的制度化、重视合作纠纷的解决等方面。合作领域不断深化,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贸易一体化、产业结构转移和升级、搭建信息服务平台等项目和内容不断扩大;创建了长期互动的组织机制,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联席会;签署了诸多合作协议,如《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合作宣言》、《长三角道路运输合作和一体化协议》、《长三角人才开发一体化共同宣言》、《长三角区域环境合作宣言》、《长三角标准化服务合作宣言》、《共同推进长三角创新体系建议协议书》等;与此同时,逐渐抛弃那种"只闻雷声不见下雨"的形式主义,地方间合作重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整合效应,即便是合作中发生冲突,也力求理性解决。

应该看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取得了新进展,合作成效也日益显现。但在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进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瓶颈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成本过高。生产要素稀缺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进一步推动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涨。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等资源已越来越稀缺。据不完全统计,江苏经济每个百分点的增长将带来 2.4 万亩土地的减少。与此同时,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迫使企业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例如,劳动力缺乏造成长三角地区受用工荒困扰,劳动力工资水平顺势提高。长期依靠低成本生存的企业进入高运营成本的模式。

二是支柱产业集中度较高。长三角洲地区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自然要素禀赋相似,从而导致

农业生产结构、加工制造业相似。另外,地理位置的毗邻、经济联系的紧密促使企业间互相学习和模仿,外资企业的大量涌进,成为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的主要原因。相关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产值规模在前十位的十大行业中,排在前五位的城市如上海、苏州、无锡、杭州和宁波的产值集中度都超过了 65%,其中集中度最高的是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集中度达 93.9%,主要集中在上海(39.7%)、宁波(32.1%)和南京(18.1%)三大城市<sup>[9]477</sup>。

三是合作机制不成熟。当前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协调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一是区域协调的规章不健全。政府层面至今还没有一个较权威、较系统、较规范的统领长三角地区合作体制和机制的政府规章,进而影响了区域内政府间的合作进程。其二是缺少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当前长三角区域管理仅靠松散的行政磋商,缺乏有约束力的法律效力保障机制,对已确立的平台建设和合作专题的成效缺乏评估、激励与督促检查。其三是长三角深层次合作机制尚未形成。目前,长三角区域各地方合作多关注于共同利益,而对于区域共同管治、责任共担的合作制度涉及甚少。

四是地方间恶性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长三角区域内各地为争夺生产要素与优惠政策而展开恶性竞争,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外部性,即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行使公共服务职能时对其他地方福利造成影响;机会主义,即地方政府在考虑和追求自我利益时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行为倾向;地方保护主义,即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干涉市场运行、形成市场割据的行为倾向[10]。

## 三、探索:市场配置与政府定位

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主要存在三种动力:一是"自然"动力,即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受市场要素、市场规律支配的,因此,市场经济内在驱动力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自然"动力。二是"制导"动力,即政府采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决定各地方之间、各企业之间的生产要素配置。换言之,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依靠行政指令实现的。三是"自然"动力与"制导"动力的合力,即"混合"动力,依靠市场与政府合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1]231-234。

实践表明,世界上很难找到单独靠市场或政府的一种推动力来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案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亦如此,国际上公认的以纽约、伦敦、东京、巴黎、芝加哥为核心的世界五大都市圈,它们在产业结构、城市规划等方面无不是以市场和政府的合力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市场对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而政府则对市场机制的发育、市场体系的健全、市场规则的完善以及市场环境的优化起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因此,从总体上来说,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量来自于市场与政府,依靠"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共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也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的产物。

首先,中国经济转型的环境背景为地方政府推动区域一体化提供了制度空间。由于市场缺失,企业家和民间资本力量薄弱,信息与信用制度严重落后,地方政府的介入实现了对市场、企业家的替代,有利于经济起飞[11]。研究表明,在转轨初期,地方政府更具有"企业家精神",形成了对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计划体制的替代。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的分权改革和财政体制转型等强制性制度变迁调整了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促使地方政府与企业关系发生变化。政绩评价、官员升迁的政治利益与地方经济利益充分结合,形成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强烈要求,地方政府与企业因而成为利益共同体。在转轨初期,地方政府充当"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了市场化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并创造了"中国奇迹"。

其次,政府与市场在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发展中的角色和功能各异。在上海,是以政府主导、 政策创新为核心展开一系列的自主创新。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总体思路, 将解决国有企业亏损、促进竞争、提高经济效益作为改革的核心任务,通过吸引外资投入、开放资本 市场,实现了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围绕浦东新区"特区效应"、上海"四个中心"建设 而不断展开制度创新。在浙江,民营经济自发创新与政府增进的特征明显。其中,"温州模式"就是 浙江发展的一个缩影。浙江模式可以说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由民间力量推动为主的一种发展 模式。浙江模式是由早期的"温州模式"发展而来的,历经以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城市化 和工业化为特征的一系列制度变迁过程;江苏则经历了从"苏南模式"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模式。 "苏南模式"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最早提出的,包括传统"苏南模式"与新"苏南模式"。传统"苏 南模式"是指在中国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苏南地区农民集体办工厂、发展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 农村经济现象。而新"苏南模式"是指苏南乡镇企业利用地处沿海的有利条件,抓住改革开放的战 略机遇,立足本地经济特色,实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外贸、外经、外资一起抓,对外合作发展势 头强劲,实现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园区经济也是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如此高速的发 展促成了江苏经济园区的兴起,形成了产业集群的经济园区。以五个国家级开发区(苏州园区、苏 州新区、昆山开发区、张家港保税区、无锡高新区)和一个省级开发区(吴江开发区)为代表,构成了 苏南经济的新亮点。

最后,市场主导、分工又合作的经济发展模式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基本规律。上海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以发展"四个中心"服务型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大都市,浙江是以民营经济著称于世,而江苏则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为经济融合提供了良好条件。当各地有与之相适应的且互有差异的经济发展动力、地方主导产业、人力资源状况、商品市场经济时,才具有互相合作的价值。这些互有差异、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当地生产力,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这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必然趋势。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一种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当局主导的政策行为,而是一种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的必然进程。在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加大,区域整体化增强。因此,对政府部门来说,不应想当然地去进行统一发展政策,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资源整合,并为此去建立更多的行政协调机构,而应制定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遵循市场规律,顺其自然地放弃更多阻碍区域内资源要素流动的管制,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还给经济发展的主体——市场。

# 四、趋势:整体联动与制度创新

实践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区域内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了资源共享、功能互补、联动发展、利益共享,并初步形成了区际分工与协作的发展格局。但是,面对国内外的激烈挑战以及长三角地区自身发展瓶颈的制约,未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腾飞的路径选择与制度安排是什么呢?

首先,在长三角区域合作模式上,实现从各自为政到联合治理的转变。随着长三角区域跨域交往的频繁,各地的共同利益领域不断扩大,许多问题都日益上升到区域层次。各地无法仅仅根据本地的需要和条件来设定发展目标而置其他地方利益于不顾,必须从区域的角度来选择本地的发展目标,形成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由于地方政府受到其他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公共政策选择也部分地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因此,双边或多边的政府合作或联合治理便提上议程。

长三角区域联合治理的形式与内容主要有:(1)创建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长期互动机制。长期

互动机制有利于政府间减少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在心理上培育合作互动的期望。(2)加强公共管理与服务。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人力资源、户籍管理、技术开发等领域,不断加强合作。(3)规划合作。统筹兼顾、优化整合长三角区域经济圈内的资源配置,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4)统一法制。受地方利益的驱动,地方立法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性法律法规与行政法规矛盾、法规"大而全"或"小而全"、重复立法、互相抄袭等现象,因而需要在长三角区域内协调立法。

由于网络化的区域治理模式有利于克服现有区域公共事务的管理困境,因此,这亦将是长三角区域联合治理的未来趋势<sup>[12]</sup>。所谓"网络化",是指由多个独立的个人、部门和企业为了共同任务而组成联合体,其运行不依靠传统的层级控制,而是在成员角色和各自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密集的多变联系、互利和交互式的合作往来完成共同目标<sup>[13]146</sup>。因此,基于网络治理的思考,未来长三角区域联合治理模式至少应有这些特点:(1)区域公共事务的参与主体多元化,不仅仅有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有企业、公民、各种非营利组织等;(2)以解决问题为焦点和行动导向,弱化科层等级制色彩,强调各种主体的跨层级互动、协商对话;(3)重视信任与合作,网络模式下各参与主体不是孤立的,当它们无法依靠自身的资源获取目标时,它们会主动进行联系,因此,它们的策略是合作信任而不是竞争。

其次,完善区域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区域利益共享。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区域一体化的逻辑起点仍然是"经济人"理性;区域合作每前进一步,都蕴涵着成员间利益重新调整和再分配,寻求新的利益平衡点。区域合作与区域一体化中存在和引发的矛盾,如产业同构、人力资源的外部性、市场割据等均与利益有关。因此,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质上也就是区域共同利益目标的探索过程和区域共同利益机制的形成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同利益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基础和动力源泉。这种共同利益又被称为"发展红利",是指一个区域由于空间结构、网络结构、产业结构、人力结构和营销结构的趋优调整,而在等级、有序、互补、高效的整合中所获取的额外收益和潜在收益的总和。它包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费用、建立知识网络、拓展国际机会等内容[14]182-184。

既然区域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那么如何实现共同利益呢? 首先是构建区域利益共享机制,即立足于区域内各主体利益关系,充分考虑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通过规范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行为,以达到防止利益分配不均的目的。区域共享利益机制的建立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在组织形式上,金字塔式的科层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应改为正式组织与企业、居民、非营利组织相互联结的网络结构;在制度形态上,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特别应重视互信、互利、互助、互动的非正式制度;在治理结构上,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开放、透明、便捷的参与渠道;在治理途径上,由以行政协调为主的科层制形式,改为市场、行政、法律、第三方参与等多途径协商;在内容上,完善以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政绩竞争、市场统一为主的利益冲突与协商机制。

利益补偿机制是实现利益共享的重要内容。利益补偿本质上就是利益再分配。如果说利益共享强调的是效率,鼓励成员各方应获得自己应得的那份利益,那么利益补偿强调的则是公平,对区域利益进行再分配,从而使成员各方分配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状态。那么,如何实现利益补偿呢?可通过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来实现,如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等手段,也就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再分配的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央政府通过规范的利益转移来实现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利益补偿。

最后,区域政策一体化既是长三角区域经济圈的形成标志,也是区域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制度是否统一是衡量区域经济圈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尽管经济一体化内涵中,产品与要素、产业结构布局、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城市体系与布局等均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内容,但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高阶段的定义,制度统一既是该阶段的显著特征,也是区域经济圈最终形成的标志。按照巴拉

萨(Bela A. 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的阶段划分,经济一体化历经贸易一体化、要素一体化、政策一体化、完全经济一体化四个阶段<sup>[15]10</sup>。完全经济一体化(Perfectly Economic Integration)是指各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已经达到了完全的统一,所有的商品、资金、资源等经济要素实现完全自由流动,没有外汇管制,统一价格管理机制等等。完全经济一体化通常存在一个共同的组织管理机构,由各国要员轮流担任,且各成员实行统一的制度。当今的欧盟是世界上最接近此形态的一体化组织。

区域政策一体化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规则的形成是多元利益主体间相互博弈、长期演变的产物,体现了参与者的一致意见;第二,将规则以明确的、文字的形式规定下来,具有较强的制度性;第三,有正式的执行机制,具有可操作性。在一体化实践中,一般是由区域协调管理机构和中央政府充当地方利益纠纷的中间人,就违规行为作出裁决,以一种正式的方式维护区域合作规则。目前国际上区域政策一体化的安排,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开放和增加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将外部溢出效应"内部化"作为对实行自由贸易的成员方进行补偿等机制来实现的。

研究与事实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大障碍在于制度不统一。不同行政主体的政策和制度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和矛盾,这也正是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因素。克服"政出多门、各自为政"、从内部政策走向区域政策,成为未来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借鉴国外做法,为了实现长三角区域政策的一体化,应进一步全面清理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应充分协商区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打破市场封锁,鼓励经济组织在区域内自由开展经济合作。通过上述公共政策一体化的措施,实现区域一体化。

#### 「参考文献]

- [1] 张兆安:《大都市圈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兼论长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年。[Zhang Zhaoan, Metropolita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anghai: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2006.]
- [2] 汪伟全:《长三角"两省一市"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华东经济管理》2009 年第 3 期 ,第 5 8 页。[Wang Weiquan,"A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s of Two Provinces and One Prefecture within the Yangzi River Delta," East China Economic Management, No. 3 (2009), pp. 5 8.]
- [3] 刘志彪、郑江淮:《冲突与和谐:长三角经济发展经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Liu Zhibiao & Zheng Jianghuai, Conflict and Harmony: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 刘志彪:《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Liu Zhibiao, Th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0.]
- [5] 洪银兴、刘志彪:《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年。[Hong Yinxing & Liu Zhibia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Mechanism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6] 靖学青:《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结构趋同的实证分析与理性思考》,《学习与实践》2006 年第 10 期,第 21 25 页。[Jing Xueqing,"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nd Rational Thinking on the Structural Convergence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Learning and Practice, No. 10 (2006), pp. 21 25.]
- [7]徐现祥、李郇:《市场一体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第57-67页。[Xu Xianxiang & Li Xun,"Market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No.12(2005),pp.57-67.]
- [8] 顾江:《长江三角洲文化市场—体化水平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08 年第 1 期,第 25 29 页。 [Gu Jiang, "Studieson the Integration Level of the Cultural Marke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No. 1(2008), pp. 25 29.]

- [9] 长三角联合研究中心主编:《长三角年鉴(2009)》,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The Yangtze River Delta Joint Research Centre (ed.), Yangtze River Delta Yearbook (2009), Nanjing: Hohai University Press,2009.]
- [10] 汪伟全:《地方政府竞争秩序的治理:基于消极竞争行为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Wang Weiquan, Competition Order Governanc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 Study of Behavior Based on Negative Competitio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9.]
- [11] 洪银兴:《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和地方政府的转型》、《经济研究参考》2005 年第 72 期,第 23 27 页。 [Hong Yinxing," New Developments in the Sunan Model and Local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72 (2005), pp. 23 27.]
- [12] 陈瑞莲等:《区域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Chen Ruilian, et al, Regional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8.]
- [13] R.S. Achrol & P.Kotler, "Marketing in the Network Economy,"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63, Special Issue (1999), pp. 146 163.
- [14] 王于渐等:《重返经济舞台中心: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融合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Wang Yujian,et al, Return to the Center of the Economic Stag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15] B.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2.

书 名:《论道德与文学——休谟论说文集卷二》

•新书架•

作 者: [英] 大卫・休谟

译 者:马万利 张正萍

定 价:32.00元



内容简介: 休谟(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至1776年8月25日)是苏格兰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本书主要收录了休谟关于文学、道德、文化等方面的论说文,主要包含休谟所有论说文中除去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论说文,共计21篇。例如休谟论罗马晚期斯多亚学派、怀疑学派,论自杀、灵魂不朽等方面的论文。休谟论说文文笔较好,可读性强。本书邀请了相关研究者根据有关苏格兰启蒙运动及休谟的新近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和诠释,把休谟的所有论说文集全部翻译成中文,是国内第一个全译本。

发行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浙江大学出版社

邮 编:310028

电子邮箱: faxingbu2004@ zju.edu.cn

电 话:0571-88925591、88273163